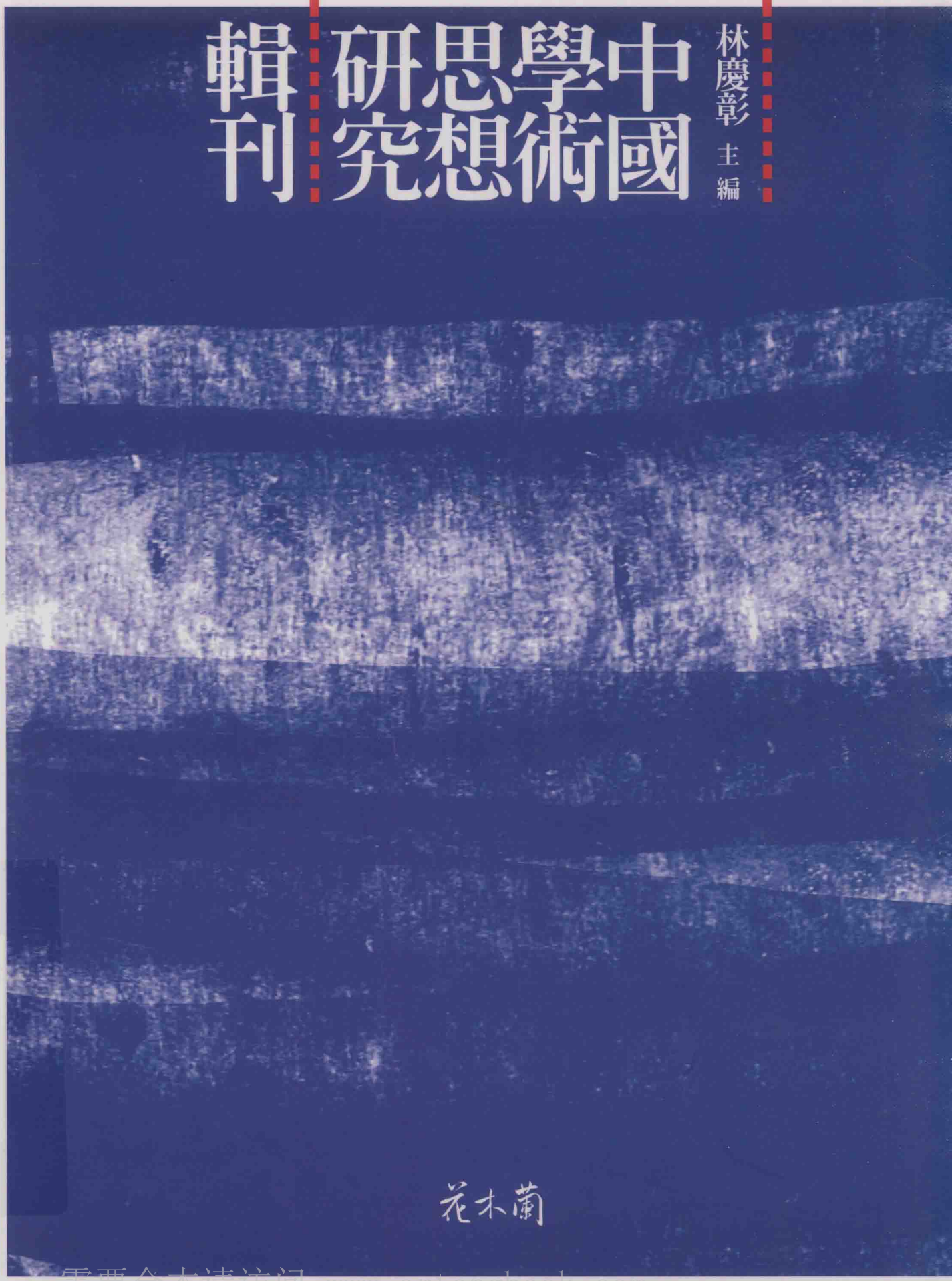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林慶彰 主編



花木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七編

林慶彰主編

第17冊

曾國藩與梁啓超
——以儒家文化傳承爲主線的考察

秦美珊著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曾國藩與梁啓超——以儒家文化傳承為主線的考察／秦美珊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民107〕
目 2+20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七編；第 17 冊）
ISBN 978-986-485-387-8（精裝）
1.（清）曾國藩 2. 梁啓超 3. 學術思想 4. 儒學
030.8 107001881

ISBN-978-986-485-387-8
9 789864 85387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七編　第十七冊　ISBN：978-986-485-387-8

曾國藩與梁啓超
——以儒家文化傳承爲主線的考察

作　　者　秦美珊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　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傳眞：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8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80067 字
定　　價　二七編 25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曾國藩與梁啓超
——以儒家文化傳承爲主線的考察

秦美珊 著

作者簡介

秦美珊，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UPM）現代語言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先後於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臺灣南華大學文學系及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本科、碩士及博士學位。主要關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

提　要

曾國藩與梁啓超是中國近代史上兩位重量級的人物，基於他們生活的空間並不曾交疊，而且二人留於後世的形象又大相徑庭，因此他們之間的微妙聯繫常常被忽略。梁啓超對曾國藩的敬仰之情，在他編撰《曾文正公嘉言鈔》、《節本明儒學案》以及《德育鑒》等書中展露無遺。曾氏和梁氏的家書，更是兩人重要的交匯點。曾國藩雖是梁啓超人生道路上的一位精神導師，但在把曾氏標舉爲取法楷模之際，梁氏依然保有自身的評價和取捨標準，並非盲目追隨。

儒家文化是曾國藩和梁啓超身上重要的養分，影響著他們的人生道路和立身處世的原則。在曾、梁那裡，儒家文化既是傳統的延續，也因應時代需求有所調整和拓新。身爲儒家文化的忠誠信奉者，曾國藩的人生道路可說是一步步循著修身、齊家和治國的步驟在努力。同樣在儒家文化滋養下成長的梁啓超，卻因過早來臨的政治聲望，促使他先行在救國救民的事業上投注心力，爾後再回歸到儒家學說中「內聖外王」的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是梁啓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中給予曾國藩的高度評價。多年以後，同樣的評價也在梁啓超身上獲得展現。曾國藩和梁啓超身上豐厚的儒家文化底蘊，是他們一生成就的基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次

導　論……1
　第一節　研究旨趣……4
　第二節　研究綜述：回顧與前瞻……9
　第三節　研究思路與各章安排……16
第一章　「以修身為本」……19
　第一節　「以德潤身」與「以德薰人」……21
　第二節　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分合……28
　第三節　「私德」、「公德」與道德社會的理想……35
　小　結……43
第二章　「家庭日用之間」的「絕大學問」……45
　第一節　孝友傳家的和睦家風……48
　第二節　著意寒士門風的培育……59
　第三節　因材施教的成功……69
　小　結……83
第三章　安邦救國的「外王」之道……85
　第一節　從民本思想到民權意識……87
　第二節　「賢人政治」的追求……94
　第三節　引進西方科技與採納西方政體……101
　小　結……110
第四章　為人推敬的學業與文章……113
　第一節　打破儒學門戶與匯通儒學、西學……116
　第二節　從傳統到現代的治學方法……125
　第三節　「桐城派」的中興與「新文體」的開創……134
　小　結……141
結　語……143
參考文獻……151
附錄一：梁啟超和曾國藩的人格修養與救國理想……159
附錄二：《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採補其所
　本無而新之」的學術典範之作……181
後　記……201

導　論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和西方文化的交匯，掀開了歷史的新篇章。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迫使清政府打開原本緊閉的大門之後，西方文化隨之傳入中國，並在排拒和接納之間，逐漸撼動中國的文化傳統。跨入二十世紀，梁啓超於 1901 年 6 月 26 日在《清議報》上發表了《過渡時代論》一文，開宗明義地說：「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註 1〕，因爲「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註 2〕。當時的梁啓超以其敏感的政治和新聞觸覺意識到，中國已經不能再固步自封，而是必須隨著時代需求，跨入一個新的紀元。在梁啓超看來，處身過渡時代雖有其危險性，卻又充滿著各種可能和希望。站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點上，回首過往和瞻望未來，成了既艱難卻又充滿挑戰性的工作。在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各種新思想、新事物紛至沓來，然而傳統的力量亦同時與之相互拉扯。此際，無論是欲停留在傳統道路或是瞬間改換至一條全新的跑道，勢必皆有其難度和局限性。於是，一條從傳統過渡到新世界的橋樑應運而生。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是時代與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過渡時代也不例外。梁啓超即表示：

> 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時勢、英雄，遞相爲因，遞相爲果耶？吾輩雖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雄。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以適於時代之用爲貴。故吾不欲論舊世界之英

〔註 1〕梁啓超：《過渡時代論》，《清議報》第 83 冊，1901 年 6 月 26 日（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一日），第 1 頁。

〔註 2〕梁啓超：《過渡時代論》，《清議報》第 83 冊，第 1 頁。

> 雄，亦未敢語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註3〕

梁啓超在寫《過渡時代論》時，自認並非英雄人物，故而期待過渡時代之英雄的出現。時過境遷，回首歷史的發展，梁啓超何嘗不是當時那一個過渡時代的英雄人物？畢竟，當時的梁啓超，總是站在時代浪潮之巔，以他手中那一支「別有一種魔力」的筆，影響著當時的社會思潮和輿論界。或者可以說，也間接影響著歷史的發展和走向。

在梁啓超〔註4〕誕生之前的約莫一個甲子，出生於湖南長沙的曾國藩〔註5〕同樣也是一個因爲時局動盪而崛起的人物。存在於咸豐及同治年間的太平天國，動搖了清朝政局，導致曾國藩這一介翰林也踏入沙場，領兵作戰。剿滅太平天國的功績無疑是曾國藩與曾國荃兄弟迅速崛起的契機，然而事情總是一體兩面，在讚譽聲中也夾雜著批評的聲浪。只是，在褒與貶之間，不能否定的是，清政權的壽命的確因爲曾國藩在沙場以及朝堂上的貢獻而得以延長，並帶來了「同治中興」時代。雖說曾國藩與梁啓超同樣因爲動盪的時局而成了各自時代的英雄式人物，然而兩人面對的時局又不盡相同。曾國藩面對的主要是中國內部的太平軍起義，但基本上太平天國並未撼動清政權的根基。到了梁啓超處身的光緒年間，甲午戰爭之敗讓康有爲和梁啓超意識到，清政府已經不能再死守這一個「老大帝國」，而必須從政治體系上作出改變，以圖自強。

細觀曾國藩與梁啓超這兩位時勢所造就之英雄，若以曾國藩生活的時代以及他對清朝的貢獻來劃分，將他歸入「舊世界之英雄」想必更爲貼切。因此，曾國藩這位「舊世界之英雄」與梁啓超這位「過渡時代之英雄」自然也會呈現出不同的兩種風貌。前者循規蹈矩，走的是傳統的事功之途；後者則具備過渡時代所須之冒險精神，開拓出新的政治途徑。俗話說「識英雄重英雄」，即使兩人無緣生活在同一時空中，梁啓超卻對這位在自己誕生的前一年長眠於黃土之下的前輩英雄心存景仰。梁啓超自然明白，足足一代人的時間差距，讓他在追摹曾國藩這位前輩先賢之際必須有所擇取。從咸豐、同治年間跨入光緒時代，治國方案當然也必須隨著時局的變化而做出調整。然而，

〔註3〕梁啓超：《過渡時代論》，《清議報》第83冊，第3頁。
〔註4〕梁啓超（1873～1929），歷經同治、光緒、宣統和民國時代。
〔註5〕曾國藩（1811～1872），歷經道光、咸豐及同治時代。

跨越時代和政治局限的人格修爲、治家方略、學問素養等面向，卻是曾國藩留給後生晚輩的人生智慧。

梁啓超對於曾國藩這位「舊世界之英雄」的崇敬之意，自然是連接著他們之間的重要線索。然而，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元素是，貫穿在他們身上的儒家思想和修爲，亦讓他們在人生的價值取向上展現「一脈相承」之態。即便曾國藩和梁啓超生活的時間和空間在流動，但儒家思想和修爲在他們身上卻同樣閃現著耀眼的光芒，且無法從他們一生的功績中抽離出來。作爲儒家文化忠誠的信徒，曾國藩時時刻刻身體力行，展現出「儒者」的風範，並在國家危難之際，以儒家思想作爲救國、治國的重要資源，延續了清朝的命脈。黃遵憲對曾國藩一生的功勞，即有客觀的讚譽，認爲曾國藩乃「結從古至今名儒、名臣之局」〔註6〕的人物。然而，黃遵憲此一評價也同樣意味著，以儒家基石開展出來的「名儒」、「名臣」之局，已至終了的時代，不得不尋找新的轉向。故此，在隨之而來的過渡時代中，梁啓超不管是在自覺或不自覺的狀態下，儒家文化在他身上的的確確被賦予新的生命，並在「淬厲」和「採補」的雙重原則下，把不合時宜的成分加以篩選，同時配合時代需求，融入一些新的元素，綻放出新的生命力。

1925年12月，梁啓超在撰述《政治家之修養》一文時，依然不忘把曾國藩標舉爲值得學習的座標式人物。文中指出：

> 在中國歷史上之政治人物，可資吾人之模倣者，遠之如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近之如曾國藩，胡林翼等等，惟在學者任擇；但近者則較遠者易於模倣，曾與胡皆出自書生，處危難之勢，肩重大之任，而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互相策勉，互相扶助，其精神誠有足多者。〔註7〕

由此觀之，梁啓超極爲欣賞曾國藩、胡林翼等即使身爲一介書生，但在面對國家危難之際，亦勇於挺身而出，征戰沙場以保衛國家的氣概。當然，梁啓超於此也碰觸到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即生活年代較爲靠近自己的前輩先賢，時代隔閡較少，且貼近自己面臨的時代問題，師法起來自然較爲得心應

〔註6〕黃遵憲撰、吳振清等編校：《致梁啓超書（九通）》，《黃遵憲集（下卷）》，第497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

〔註7〕梁啓超著、夏曉虹輯：《政治家之修養》，《〈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冊）》，第990～99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手。梁啓超此說，顯然可視爲他極力標舉曾國藩爲學習楷模的注腳。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註8〕這是中華民族在儒家文化薰陶下，根深蒂固的人生哲理。曾國藩和梁啓超在儒家文化滋養下的人生理想，自然也以此爲依歸。曾國藩一生的成就，是此一理想追求的典型；反觀梁啓超，即便他的政治道路並不順遂，然而他卻可以適時地調適自己，選擇以不同方式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固守儒家文化價值觀。錢穆在其《中國學術通義》一書中寫道：

> 晚清末，國事日非，一時學者，競思學以致用，乃頗好言諸葛亮、王陽明、曾國藩三人。從政、治軍，不忘於學，而更要乃在其皆不背於孔門德行之科，乃更爲清末人所愛言。然慕其人，當知慕其學。無其學，又何從得其人。〔註9〕

此一說法，雖是從學術角度探討晚清社會思潮，其實卻是鞭闢近裏，總攬全域之言。諸葛亮、王陽明、曾國藩三人，皆是梁啓超非常敬仰的前輩先賢，特別是王陽明和曾國藩，更是梁啓超在編撰《德育鑒》時，重點推崇的儒林先進。錢穆一針見血地指出：「無其學，又何從得其人。」這其實也表明，正因爲「不背於孔門德行之科」，才成就了他們一生偉大的人格和成就，並成爲後代追摹的典範。

第一節　研究旨趣

基於曾國藩和梁啓超生活的時空並未曾交疊，兩人留於後世的形象又大相徑庭，因此二人之間微妙的聯繫常常被忽略。在梁啓超筆下尋找曾國藩，或可從在湖南籌辦時務學堂時期的梁啓超開始追溯。湖南時務學堂創辦於1897年10月，當時的梁啓超已因1895年的公車上書而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特別是1896年8月《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梁啓超以主筆的身份發表《變法通議》等諸多關切時局的論說文章，風行一時，迅速成爲輿論界之驕子。所以，當維新派人士在湖南推動新政並創辦時務學堂時，梁啓超自然被陳寶箴、

〔註8〕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上、中、下）》，第159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

〔註9〕錢穆：《中國學術通義》，收錄於《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5冊，第219頁，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年。

黃遵憲、譚嗣同等人所看重，推舉爲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此時的梁啓超顯然已捲入清朝末年的政治漩渦中，其政治關懷與敏感度也讓他對過往的歷史事件和朝廷重臣有所關注。1898 年 4 月，梁啓超在《湘報》上發表的《論湖南應辦之事》即提到：

> 聞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時與幕府縱譚，若有事應商，則集幕府僚屬，使之各出意見，互相辯論。文正則不發一言，歸而採之，既可於此事集思廣益，復可見其人之議論見地。〔註 10〕

可見，此時的梁啓超已經開始關注曾國藩與其幕僚們的關係，並強調了曾國藩集思廣益、匯納百川的處事手法。而且，聽取幕僚意見這一過程，也同時是曾國藩知人識人的一個管道。此時的梁啓超雖沒有凸顯曾國藩的示範意義，但有意無意間，仍將他視爲值得學習的榜樣。與此同時，一個有趣的巧合是，此時因任職湖南時務學堂而居於長沙的梁啓超，恰恰是踩在曾國藩故鄉的土地上。

從擔任湖南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到 1898 年 6 月 11 日維新變法的展開，梁啓超的政治參與度逐步邁向政權中心。然而，僅僅持續了 103 天的維新變法，卻讓梁啓超的政治道路發生了急轉直下的巨變。戊戌政變的發生，導致梁啓超淪爲政治犯並流亡日本。即便如此，梁啓超熾熱的愛國之情卻未因此而熄滅。1900 年，在前往檀香山籌辦保皇會事宜的路途中，梁啓超偶然閱讀到曾國藩家書，並給他帶來很大的啓發與震撼。這一點，梁啓超在同年寫給康有爲、葉湘南、麥孟華等師友的信中皆一再提及。或許，正是梁啓超此時流亡異鄉的不同心境，讓他在閱讀曾國藩家書時產生新的體悟和共鳴。換成此前在政治上意氣風發之際的梁啓超，可能更爲吸引他的是曾國藩在政治上的謀略和貢獻。

戊戌政變的發生，對梁啓超而言，也許不僅僅是一次政治運動的被扼殺，流亡日本期間，其實也可以說是他重新審視自己過往年少得志的冷靜期。這樣一個機緣，讓梁啓超在閱及曾國藩對孩子以及弟弟們的循循教誨時，明顯有所觸動，特別是在修身自勉、處事待人、持家報國等方面。這樣一個反躬自省的沉澱過程，讓梁啓超不僅僅在自身修爲上有所進益，而且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中也作出了相應的調整。

基於對曾國藩的崇敬，梁啓超曾在 1902 年興起爲曾國藩寫傳記的念頭。

〔註 10〕梁啓超：《論湖南應辦之事》，《湘報》第 28 號，1898 年 4 月，第 109 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事當可追溯至1901年11月李鴻章去世，梁啓超即在一個月之後，以李鴻章爲敘述主軸，寫成《李鴻章》一書，此著別題爲《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然而，既然所寫爲「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又以李鴻章爲脈絡，自然無法排除曾國藩的存在。透過此文也可看出，梁啓超對曾、李二人的評價顯然有高下之分。他在評述中如此寫道：

> 李鴻章之於曾國藩，猶管仲之鮑叔，韓信之蕭何也。不寧惟是，其一生之學行、見識、事業，無一不由國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鴻章實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評。〔註11〕

就這一段話來分析，既然作爲學生的李鴻章都與中國四十年來發生的大事緊密相關，更何況是身爲老師的曾國藩。因此，在當時的梁啓超看來，爲曾國藩立傳顯然有其必要性和價值。於是，在《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脫稿之後，梁啓超在寫給黃遵憲的信中，即提到有意爲曾國藩作傳，並徵求他對曾國藩的評價。梁啓超欲爲曾國藩寫傳記的想法最終並未落實，顯然與黃遵憲對曾國藩的評價有直接關係。在梁啓超的著述中，也可發現他曾動筆撰寫《曾文正年譜初稿》，可惜並未完成，僅存五頁殘稿。〔註12〕這五頁《曾文正年譜初稿》，或許正是梁啓超準備爲曾國藩寫傳記的前期工作。雖說梁啓超最終放棄爲曾國藩立傳的念頭，然而，他對曾氏的敬仰之情還是可以從其他文章中窺見。特別是梁啓超積累多年輯錄而成的《曾文正公嘉言鈔》在1916年的正式出版，當可視爲是他對曾國藩另一種形式的致敬。

梁啓超在1902年寫給黃遵憲的信中對曾國藩有怎樣的評論已無從知曉，但既有爲曾國藩作傳的意願，想必對他基本持肯定態度。然而，黃遵憲在給梁啓超的回信中有關曾國藩的評論，一舉打消了梁啓超想爲曾氏立傳的滿腔熱情。黃遵憲在信中說：

> 公欲作《曾文正傳》，索僕評其爲人。僕以爲國朝二百餘年，應推爲第一流。即求之古人，若諸葛武侯，若陸敬輿，若司馬溫公，若王陽明，置之伯仲之間，亦無愧色，可謂名儒矣，可謂名臣矣！雖然，僕以爲天生此人，實使之結從古迄今名儒、名臣之局者也。其學問能兼綜考據、詞章、義理三種之長。（舊學界中卓然獨立，古

〔註11〕梁啓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飲冰室合集》第6冊第3卷，第8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月第一版（2008年11月第5刷）。

〔註12〕參見梁啓超：《殘稿存目》，《飲冰室合集》第6冊，第2頁。

文爲本朝第一）然此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於今日泰西之科學、之哲學未夢見也。〔註 13〕

在這一段論述中，黃遵憲首先肯定了曾國藩的才幹和學識，不過，在他的評價中，曾國藩終歸只是一介名儒、名臣。根據黃遵憲的觀察，時局已經發生了變化，名儒、名臣的時代已經在曾國藩身上畫上了句號。自此以後，中國需要的是通曉中國與西方文化，並瞭解國際時局的新一代人才。換言之，在曾國藩這一位「舊世界之英雄」的時代終結之後，繼之而起的將會是「過渡時代之英雄」引領社會的新世代，而此一「過渡時代之英雄」，非梁啓超莫屬。

黃遵憲在回覆梁啓超的信中，還有一段對於曾國藩的評述，見解精闢獨到。黃遵憲結合歷史因素，指出曾國藩可以在咸豐、同治時期力挽狂瀾，並不表示梁氏也可以在光緒年間建立同樣的功業，其關鍵緣於清朝的整個局勢已不復以往。黃遵憲表示：

曾文正者，論其兩廡之先賢牌位中〔註 14〕，應增其木主，其他亦事事足敬，然事事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文正之卒在同治末年，爾時三藩未亡，要地未割，無償款，無國債，軌道、礦山、沿海線之權未授之他人。上有勵精圖治之名相，（文祥。）下多奉公守法之疆臣，固儼然一大帝國也。文正逝而大變矣。吾故曰：「天之生文正，所以結前此名臣、名儒之局者也。」佛言「謗我者死，學我者死」。若文正者，不可謗又不可學者也，不亦奇乎！〔註 15〕

透過此一觀察，黃遵憲給予曾國藩的評價是「不可謗又不可學者也」。黃遵憲對曾國藩的這一解讀，焦點鎖定在曾國藩的政治與治國方略上，這與梁啓超所看重的曾國藩「可學」之處並不屬於同一層面。梁氏在閱讀曾國藩家書的過程中所受到的啓發，更多是在自身的人格修養、待人處事、持家之道以及治學等方面，皆是超越政治與時代局限的層面。當然，一個不能否定的事實是，梁啓超在看到黃遵憲的回信後，動搖了爲曾國藩立傳的初衷，顯然還是對黃遵憲的看法持認同態度。然而，梁啓超對曾國藩的敬仰之情以及將他視

〔註 13〕黃遵憲撰、吳振清等編校：《致梁啓超書（九通）》，《黃遵憲集（下卷）》，第 497 頁。

〔註 14〕原注：「論其」二字下原稿有「品立」二字，字右旁有墨點，表示抹去。

〔註 15〕黃遵憲撰、吳振清等編校：《致梁啓超書（九通）》，《黃遵憲集（下卷）》，第 498 頁。

爲學習典範的想法，卻並未因此而消泯。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沉澱之後，梁啓超似乎從曾國藩身上見證了從人格修養連接至救國理想的橋樑。簡言之，即爲儒家的內聖外王之典範。細加探索，即可窺見梁啓超從曾國藩身上擇取的是一種不被時代所局限的治國理念和實踐能力。這一點，足以讓曾國藩在不同的時代展現其政治家風範。當然，在邁向外王的途徑中，內聖的修爲也必須一步一個腳印地落實。因此，儒家的修身之學自然成了必要的功課，而曾國藩在此一環節上，恰恰爲他的後生晚輩們提供了不少門徑。從胡林翼、李鴻章到梁啓超等人，皆從曾國藩身上學習到修身工夫的下手處。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即便梁啓超把曾國藩當成值得學習的前輩，卻也並非一味模仿和複製。稍加留意即可發現，曾國藩較爲重視儒家先哲的修身之學，而更爲牽動梁啓超的則是「致良知」似的體悟。於此觀之，體現在曾國藩和梁啓超身上的修身、齊家、救國、治學這幾個相互連接的環節中，儒家思想是貫穿其中的主線。而且，在曾國藩和梁啓超的手中，這一文化資源顯現爲一種「活」的狀態，在展現出不同風貌之際，也具有源遠流長的生命力。

曾國藩和梁啓超這兩位在各自的時代極爲耀眼的「英雄式」人物，產生的影響絕不僅止於他們生活著的那個年代。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的事功，雖曾讓他被斥爲「漢奸」或「劊子手」，然而排除掉政治立場的牽絆，並不影響曾國藩在不同的時代發光、發熱。曾國藩留下的文字遺產，從私人性較強的家書、書信、日記到公開的奏稿或批牘，皆是可以探察其一生思想和行事的記錄。以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爲起點，曾國藩一直都是政治領袖追慕和學習的對象。這當中，「過渡時代之英雄——梁啓超」自然也扮演著過渡橋樑的角色。同樣地，梁啓超發表在《時務報》、《清議報》以及《新民叢報》的報刊文字所興起的啓蒙風潮，也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從胡適、錢玄同、周作人以至鄭振鐸等在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新一代學人，皆曾指出梁啓超的文字給予他們思想上的震撼和啓發。故此，從「舊世界之英雄」的曾國藩到「過渡時代之英雄」的梁啓超，這兩個隔代知音的關係，實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曾國藩和梁啓超皆是在儒家文化滋養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英雄人物」，若抽離這一立足地，他們二人也將顯得蒼白和空洞。故此，儒家文化是連接二人不可或缺的紐帶。

第二節　研究綜述：回顧與前瞻

有關曾國藩和梁啓超的學術研究，若以兩個獨立的方塊觀之，只能用汗牛充棟一詞來形容。不管是曾國藩或梁啓超，歷來的學者們皆已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和面向進行探討。於是，將曾國藩或梁啓超與另一位有交集點的人物進行對讀，成了開始被挖掘的新方向。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曾國藩與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張之洞等人的關係皆一再被關注。梁啓超則較常與康有爲、胡適、嚴復、孫中山、魯迅、王國維等人被鋪展在同一平臺上相提並論。然而，將曾國藩和梁啓超擺放在一起進行研讀和分析，迄今還是一直被忽略的面向。

從清朝末年至今，曾國藩可說是中華民族圈子裏耳熟能詳的名字，而且各類從曾國藩的家書、日記、奏稿、讀書錄等文字中輯錄而成的人生哲理書籍也充斥市場。這一現象，是基於曾國藩的修身之學深爲後生晚輩所推崇；與此同時，亦得以繞開政治立場之牽絆，立足於客觀立場上進行評述。在學術圈子中，客觀視野更是一種必須。縱觀以曾國藩爲研究焦點的學術專著，曾氏與其幕府中的人物關係網歷來皆備受關注，且與此一研究論題的密合度也較高。概而言之，曾國藩幕府中的佼佼者計有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羅澤南、彭玉麟、丁日昌、劉蓉與李元度等人。早在 1947 年，李鼎芳即以曾國藩的人格特質爲主軸，進而感召其幕賓的凝聚力，並推及其幕府之活動，完成《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註 16〕朱東安亦一再探究曾國藩的幕府，從《曾國藩幕府研究》〔註 17〕至《曾國藩集團與晚晴政局》〔註 18〕，顯示著朱東安的研究既以曾氏幕府爲基，同時也肯定曾氏幕府在晚清政局的重要性。根據朱東安的考察，曾國藩幕府無疑具有「承前啓後，繼往開來」之特殊性。無獨有偶，成曉軍的《曾國藩的幕府們》〔註 19〕以及《風雨晚清：曾國藩與他的精英們》〔註 20〕二書，亦傳達出同樣的關懷。此外，成曉軍亦聚焦於曾國藩身上，探究其政治與洋務，並及人生、治學、文學、教育等理念在近代中國產生的影響，該書定名爲《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註 21〕在曾

〔註 16〕參見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上海：文通書局，1947 年。
〔註 17〕朱東安：《曾國藩幕府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
〔註 18〕朱東安：《曾國藩集團與晚晴政局》，北京：華文出版社，2003 年。
〔註 19〕成曉軍：《曾國藩的幕府們》，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 年。
〔註 20〕成曉軍：《風雨晚清：曾國藩與他的精英們》，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 年。
〔註 21〕參見成曉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湖南：湖南出版社，1991 年。

國藩幕府的光圈下，史林《曾國藩和他的幕僚》〔註 22〕、劉建強《曾國藩幕府》〔註 23〕以及姜穆編纂的《曾國藩的幕僚群》〔註 24〕、梁勤主編的《曾國藩及其幕府》〔註 25〕等書的問世，皆再再顯示曾國藩幕府歷久不衰的吸引力。身爲幕主的曾國藩，無疑是其幕賓們在修身、齊家、從政、治學上的引領者。

作爲一名儒者與朝廷重臣，曾國藩這兩個身份牽動著清末時期的文化與政治風貌。李育民即以《曾國藩傳統文化思想研究》一書，細緻地梳理曾國藩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的養分，並從修身、齊家、爲政與治學的角度深入開展論述。〔註 26〕曾琦雲則具體從「內聖外王」的角度探究曾國藩的儒家文化淵源，並從思想源流、人才觀、文學素養與修心養生等層面進行解讀，集結於《內聖外王——解讀一代儒宗曾國藩》。〔註 27〕楊國強的《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時代》，結合儒家義理之學以及實際的政治問題，探討曾國藩與李鴻章在中、西文化的拉鋸中所持有的對應之道，並探索從儒家的經世之學至洋務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具體展現。〔註 28〕身處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文化衝擊的花火，亦是曾國藩身上不容忽略的亮點。

若就曾國藩爲題的博士論文觀之，研究焦點顯然集中於曾國藩淵源於儒家思想開展而來的議題。吳國榮與楊濤即結合儒家思想的薰陶與曾國藩的人格特質進行探討，吳、楊二人的博士論文分別題爲《曾國藩的人格、學問與治術——關於儒者理想人生與精神結構的個案研究》〔註 29〕以及《曾國藩儒學士大夫人格探析》〔註 30〕。與儒家文化關係密切的倫理思想，則讓周俊武與石峰崗分別從家庭以及人才的角度深入挖掘曾國藩的倫理思想。周俊武的

〔註 22〕史林：《曾國藩和他的幕僚》，北京：言實出版社，1997 年。
〔註 23〕劉建強：《曾國藩幕府》，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 年。
〔註 24〕姜穆：《曾國藩的幕僚群》，臺灣：黎明文化事業，1987 年。
〔註 25〕梁勤主編：《曾國藩及其幕府》，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2 年。
〔註 26〕參見李育民：《曾國藩傳統文化思想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註 27〕參見曾琦雲：《內聖外王——解讀一代儒宗曾國藩》，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 年。
〔註 28〕參見楊國強：《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
〔註 29〕吳國榮：《曾國藩的人格、學問與治術——關於儒者理想人生與精神結構的個案研究》（博士論文），湖南：湖南大學，2008 年。
〔註 30〕楊濤：《曾國藩儒學士大夫人格探析》（博士論文），天津：南開大學，2012 年。

博士論文題爲《激揚家聲——曾國藩家庭倫理思想研究》〔註 31〕；石峰崗則以《曾國藩人才倫理思想研究》〔註 32〕爲題完成其博士論文。「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元素，從德育到官德，皆在曾國藩身上得以體現。劉鐵銘與江海洋即從這兩個層面進行探討，二人的論文分別題爲《曾國藩德育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註 33〕及《曾國藩官德修養思想研究》〔註 34〕。由此觀之，儒家文化在曾國藩身上展現的光芒，一直皆爲學者所關注。

儒家思想根基在曾國藩身上的具體展現，無疑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絕佳範例。然而，曾國藩在治學與詞章上的成就亦不容忽視。同樣在 2010 年，徐雷鎖定《曾國藩理學思想研究》〔註 35〕爲題，而彭昊則著重梳理《曾國藩與道家思想》〔註 36〕之脈絡，二人在同一年獲取博士學位。此外，曾國藩的詞章之學亦未被學界忽視。邰紅紅關注的是《曾國藩與桐城中興》〔註 37〕；代亮則以《曾國藩詩文思想研究》〔註 38〕爲題；郭平興撰述的《曾國藩文獻閱讀實踐與理論研究》〔註 39〕，從文獻學的角度開展論述。

在海峽的另一端，亦不乏關注曾國藩的詞章成就的研究者。陳如雄以《曾國藩古文研究》〔註 40〕爲題，從宏觀角度剖析曾國藩的詞章成就。10 年之後，謝嘉文同樣對曾國藩的詞章之學加以關注，並結合姚鼐之文鋪展在同一平臺上加以解讀，其論文題爲《「穿戴腳鐐」與「掙脫腳鐐」的舞者之舞——姚鼐〈古文辭類纂〉與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選文研究》〔註 41〕。此外，曾國

〔註 31〕參見周俊武：《激揚家聲——曾國藩家庭倫理思想研究》（博士論文），湖南：湖南師範大學，2004 年。

〔註 32〕石峰崗：《曾國藩人才倫理思想研究》（博士論文），湖南：湖南師範大學，2012 年。

〔註 33〕劉鐵銘：《曾國藩德育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博士論文），湖南：中南大學，2012 年。

〔註 34〕江海洋：《曾國藩官德修養思想研究》（博士論文），南京：南京理工大學，2015 年。

〔註 35〕徐雷：《曾國藩理學思想研究》（博士論文），湖南：湖南大學，2010 年。

〔註 36〕彭昊：《曾國藩與道家思想》（博士論文），湖南：湖南大學，2010 年。

〔註 37〕邰紅紅：《曾國藩與桐城中興》（博士論文），上海：上海大學，2008 年。

〔註 38〕代亮：《曾國藩詩文思想研究》（博士論文），天津：南開大學，2010 年。

〔註 39〕郭平興：《曾國藩文獻閱讀實踐與理論研究》（博士論文），湖北：華中師範大學，2011 年。

〔註 40〕陳如雄：《曾國藩古文研究》（博士論文），臺灣：輔仁大學，1999 年。

〔註 41〕謝嘉文：《「穿戴腳鐐」與「掙脫腳鐐」的舞者之舞——姚鼐〈古文辭類纂〉與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選文研究》（博士論文），臺灣：國立清華大學，2009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